

邵毅平◎著

论衡研究



邵毅平◎著

论衡研究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衡研究 / 邵毅平著.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309 - 06618 - 0

I. 论… II. 邵… III. 论衡—研究 IV. B234. 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287 号

论衡研究

邵毅平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03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618 - 0 / B · 312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东汉王充的《论衡》，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部巨著。本书以文献学、考据学等传统研究方法与阐释学、接受理论、比较文学、原始思维理论等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在关于《论衡》的成书时间和过程、《论衡》篇目排列的内在联系、《论衡》颂汉诸篇的写作动因、《论衡》与王充其他各书的关系、《论衡》的早期流传影响史、《论衡》的评论史、《论衡》的思想和文论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实事求是的新说廓清了长期笼罩于《论衡》的各种偏见和迷雾。

本书的韩国版（繁体字版）出版于1995年，国内版（简体字版）则始终没有出过。这次由作者精心修订后出版，以供海内外研究者参考。

韩国版自序

王充的《论衡》，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部巨著。对于《论衡》及其作者的研究，历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自1980年代初起，我便开始从事《论衡》的研究，至今已历十余年之久。在这期间，陆续写成了十五篇论文，总计二十五万字左右，先后发表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各学术刊物上。现在将它们结集为一书，以对此研究作一初步总结。

大多数《论衡》研究者的研究重点，是《论衡》的思想；但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则是关于《论衡》的成书、与王充其他各书的关系、流传、评论等等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不研究清楚，便无法正确地开展对于《论衡》的思想的研究；而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在关于《论衡》的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出现了种种问题。当然，本书也并不忽略对于《论衡》的思想的研究，只是所取角度大抵与一般流行的研究有所不同。

本书的第一编“《论衡》的成书”，旨在探讨《论衡》成书方面的若干问题。第一章《〈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考》，通过若干重要史料的分析与考证，否定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的“《论衡》的写作经历了自明帝永平初至章帝章和时或和帝永元初的三十余年”的旧说，提出了“《论衡》作于自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十余年间”的新说。第二章《王充三次撰集〈论衡〉

说平议》，对在中国的《论衡》研究界甚有影响的“王充三次撰集《论衡》说”提出了异论，认为王充是一次而不是三次撰成他的《论衡》的。第三章《〈论衡〉篇目排列内在联系考》，通过对于《论衡》八十五篇之间关系的考察，揭示了王充当初写作与编排《论衡》的基本原则：既是按时代先后的，又是有计划的。第四章《〈论衡〉颂汉诸篇写作动因考》，通过对于王充写作从《齐世》到《佚文》这组颂汉之文的隐秘动机与时代背景的考察，揭示了王充的具体写作环境的一个侧面以及东汉前期文坛的严峻状况。

本书的第二编“《论衡》与王充其他各书”，旨在探讨《论衡》与王充其他各书的关系方面的若干问题。第一章《论王充〈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书不在今本〈论衡〉之中》，对在中国的《论衡》研究界甚有影响的“今本《论衡》之中已经混合了王充的其他各书，所以王充的其他各书均未亡佚”的说法提出了异论，重新确认了认为王充其他各书均已亡佚的传统说法。第二章《王充〈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书考》，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关王充其他各书的只言片语，考察了它们的写作顺序、写作时间、写作宗旨、文章风格和亡佚情况等等方面的问题，澄清了它们与《论衡》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第三编“《论衡》的流传”，旨在探讨《论衡》早期流传史上的若干问题。第一章《蔡邕入吴始得〈论衡〉说献疑》，通过一条新的史料的发现与考证，否定了流传了一千多年的“蔡邕入吴始得《论衡》”的旧说，提出了蔡邕早在入吴之前即已读过《论衡》的新说。第二章《〈论衡〉早期流传影响考》，通过对若干史料的钩稽与分析，描述了《论衡》从成书到第一个版本出现这一千多年间的早期流传影响的状况。

本书的第四编“《论衡》的评论”，旨在探讨《论衡》评论史上的若干问题。第一章《近两千年来〈论衡〉评价综论》，考察了从《论衡》成书到近代近两千年间有关《论衡》的评价的变迁历史，并揭示了这种变迁与各个时期的思想意识的演化的密切关系。第二章《〈论衡〉评论中所反映的历代文章观的变迁》和第三章《〈论衡〉评论中所反映的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精神的冲突》，分别从文章观和思想史的侧面，考察了围绕《论衡》的评论的变迁与各个时期思想意识的演化的密切关系。

本书的第五编“《论衡》的思想”，旨在探讨《论衡》的思想方面的若干问题。第一章《〈论衡〉与〈原始思维〉比较阅读札记》，通过将《论衡》与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名著《原始思维》作比较阅读，提出了对于《论衡》中所记载的种种“迷信陋俗”的新的解释，并试图重新评价《论衡》的理性精神的划时代意义。第二章《论王充的悲观主义人生观》，对于王充的悲观主义人生观的内容和意义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探讨了它与王充自己的人生遭遇、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他整个的思想体系的密切关系。第三章《论王充文论的立说基准的多重性与统一性》，揭示了王充文论的九种立说基准，其背后的自我中心主义，试图藉此解决历来让学者们感到头疼的王充文论的自相矛盾的问题，并进而全面而系统地把握王充文论的各个方面和基本精神。第四章《论王充的功利主义文章观》，分析了王充文论中的一个核心观念，指出了王充文论在中国功利主义文论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地位。

虽然在《论衡》的研究方面，本书取得了若干新的收获，开拓了若干新的领域，但是我对此仍深感不足，觉得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海内外《论衡》研究者的兴趣，对

于他们的研究提供些微的帮助,并得到来自他们的宝贵意见,那将是我所深为盼望和不胜愉悦的。

邵毅平

1995 年 4 月 9 日识于蔚山大学校

2009 年 4 月 9 日修改于复旦大学

目 录

韩国版自序	1
第一编 《论衡》的成书	1
第一章 《论衡》造于永平未定于建初之年考	3
第二章 王充三次撰集《论衡》说平议	26
第三章 《论衡》篇目排列内在联系考	42
第四章 《论衡》颂汉诸篇写作动因考	69
第二编 《论衡》与王充其他各书	89
第一章 论王充《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书不在 今本《论衡》之中	91
第二章 王充《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书考	108
第三编 《论衡》的流传	131
第一章 蔡邕入吴始得《论衡》说献疑	133
第二章 《论衡》早期流传影响考	145
第四编 《论衡》的评论	189
第一章 近两千年来《论衡》评价综论	191
第二章 《论衡》评论中所反映的历代文章观的变迁	227
第三章 《论衡》评论中所反映的理性精神与非理性 精神的冲突	249
第五编 《论衡》的思想	267
第一章 《论衡》与《原始思维》比较阅读札记	269
第二章 论王充的悲观主义人生观	292

第三章 论王充文论的立说基准的多重性与 统一性	327
第四章 论王充的功利主义文章观	350
附 章 宋时烈与王充: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普遍性 问题	364
主要征引文献目录	388
韩国版后记	401
国内版后记	405
附录:邵毅平著译目录	407

第一编

《论衡》的成书

第一章 《论衡》造于永平末 定于建初之年考

《论衡》究竟作于何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前人对此曾有过各种说法，但或失之错误，或失之含混，尚未能有明确而可信的结论。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七《跋〈论衡〉》云：“《论衡》八十五篇，作于汉永平间。”仅为臆断之说，与事实相去甚远。朱谦之《王充著作考》^①认为，王充曾三次撰集《论衡》，定本《论衡》则为其最后之撰集，三次撰集历时约三十年。本编第二章《王充三次撰集〈论衡〉说平议》对此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王充未曾三次撰集《论衡》。胡适《王充的〈论衡〉》^②认为：“《论衡》著作的时期很可研究……据此可见《论衡》不是一个时代做的。大概这书初起在永平初年，当西历六十余年……后来随时增添修改，大部分当是章帝时的著作。直至和帝初年还在修改。故有称孝章的地方。此书最后的修正当在西历九十年左右……此书的著作与修正，前后共需三十年……但《论衡》大体是西历六十年至九十年之间做的。这是大概可以无疑的。”胡

① 载《文史》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又收入蒋祖怡《王充卷》，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本书所引据《文史》第一辑。

② 连载《现代学生》第一卷第四、六、八、九期，上海，现代学生社，1931年；又收入黄晖《论衡校释》附编四，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本书所引据《现代学生》第一卷第四、六、八、九期。

适此说,受到后来的学者的祖述。如黄晖《王充年谱》^①(以下简称“黄《谱》”)认为:“盖永平初,已属草,时辍时作,至永平末,方专精一志也。”“总上所考,则知《论衡》大半作于章帝时……至和帝永元中,还改定旧稿。则仲任于此书致力前后凡三十年,亦云勤矣。”钟肇鹏《王充年谱》^②(以下简称“钟《谱》”)认为:“永平初开始写,以后时作时辍,至建初后乃专精致力于此书之写作,边作边改,至章帝末乃完全定稿,前后近三十年。”“盖自永平初草创《论衡》,至永平末建初中乃集中精力专致意于此书之撰述,故《论衡》大部分成于建初之年。然最后定稿直至章和之时,全书创作将近三十年。”此说盖糅合两条材料而成:其一是《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论衡·自纪篇》语:“《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耳。”(此语为《论衡·自纪篇》佚文,自黄《谱》以来一直被误认作《会稽典录》语,至钟《谱》始获纠正。)其二是《论衡·讲瑞篇》末的“为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元和、章和之际……此篇已成,故不得载”一段话。两条材料似乎具有若干“矛盾”之处:一是《自纪篇》语说《论衡》“造于永平末”,而《讲瑞篇》却说本文“草于永平之初”;二是《自纪篇》语说《论衡》“定于建初之年”,而《讲瑞篇》这段话却显然是和帝永元间的笔墨。对于第一个矛盾,黄《谱》和钟《谱》是这样解决的,即或作调停之说,认为永平初是“开始写”之时,永平末才是“正式写”之时;或如钟《谱》,径将“《论衡》造于永平末”的“末”字作为“初”字之误,因此,认为《论衡》是“永平初开始写”的。对于第二个矛盾,黄《谱》和钟《谱》是这样解决的,即将“定稿”(而不是“写作”)的时间往后移至“章帝末”或“和帝初”。这样,这两条有关《论衡》作年的似乎

① 收入其《论衡校释》附编二。

② 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

“矛盾”的材料，便被糅合在一起，构成了《论衡》作年的依据，《论衡》作年遂由自“永平末”至“建初之年”的十余年，延长到自“永平初”至“章和、永元之时”的“近三十年”。这是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持之者甚多。对此，我的看法是，两条材料其实并不矛盾。《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论衡·自纪篇》语，是确定《论衡》作年的铁证；而《讲瑞篇》末的一段文字，则是确定《论衡》作年的旁证（详下文）。蒋祖怡《王充年谱》^①（以下简称“蒋《谱》”）云：“《会稽典录》云：‘《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其言可信。王充《论衡》之书，在永平、建初之际，成篇甚多。”其说甚是，惜未贯彻。本章即试图从理解《讲瑞篇》末附记的确切含义，探讨王充元和以后的生活经历，推测《论衡》各篇的大致作年，确定各篇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入手，来证成《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之说。

一、元和以后王充未作《论衡》

《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论衡·自纪篇》语既曰《论衡》“定于建初之年”，那么显而易见，元和以后王充未作《论衡》。关于这一点，有三方面的事实可为佐证。首先，《讲瑞篇》末的一段话非常值得注意：

为此论草于永平之初，时来有瑞，其孝明宣惠，众瑞并至。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时俱应，凤皇骐驎，连出重见，盛于五帝之时。此篇已成，故

^① 收入其《王充卷》。

不得载。

这段话显然作于和帝永元年间，有学者据此认为，《讲瑞篇》乃至《论衡》至章帝章和末或和帝永元中方始定稿。如黄《谱》于和帝永元元年（89）王充六十三岁条下系云：“续《讲瑞篇》稿。按：《讲瑞篇》云：‘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则其续稿，已在章帝歿后，故志于此。”蒋《谱》云：“《论衡·讲瑞篇》虽属草于永平之初，而成篇则在章和、元和之际，此篇在和帝永元中又加修改。”又云：“其中称章帝为‘孝章’，具见此篇之成，在章帝死后，或在章帝死后修改。”黄《谱》和蒋《谱》所说，尚只就《讲瑞篇》而言；钟《谱》则更据此认为《论衡》“边作边改，至章帝末乃完全定稿”。这就牵涉到对《讲瑞篇》这段话该如何理解的问题了。《讲瑞篇》这段话作于和帝永元年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其是否向我们表明《讲瑞篇》乃至《论衡》至和帝永元中（或章帝章和末）方始定稿（或又加修改）呢？我觉得完全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讲瑞篇》的这段话，恰恰证明《讲瑞篇》乃至《论衡》已于建初年间定稿，而不是到章帝章和末或和帝永元初才定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讲瑞篇》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章帝元和、章和之际嘉瑞奇物、凤凰骐驎甚多，但因为《讲瑞篇》乃至《论衡》已经定稿，所以不能载入了（请注意“此篇已成，故不得载”这八个字）。这说明章帝元和以后至和帝永元年间，王充并没有写作或修订《讲瑞篇》乃至《论衡》。因为王充如果在元和以后还在写作或修订《讲瑞篇》乃至《论衡》的话，他为什么不能将元和、章和之际的嘉瑞奇物、凤凰骐驎载入《讲瑞篇》或《论衡》的其他各篇呢？所谓“不得载”，就是“不能载”；之所以“不能载”，是因为“此篇已成”——这个“成”字，不仅是指《讲瑞篇》的“写成”，而且也是指

《讲瑞篇》在《论衡》全书中的“编定”，进而也可以认为是指《论衡》全书的已经“定稿”。（黄《谱》云：“按：《会稽典录》云：‘《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故至元和、章和之际，《讲瑞篇》稿已成。”其释《讲瑞篇》末附记“元和、章和之际……此篇已成”之含意，甚为妥帖。）所以，王充只能于永元年间在《讲瑞篇》末添个“附记”，而不能加以“补写”。尽管《论衡》全书中有这种“附记”的只有《讲瑞篇》一处，但是，“此篇已成，故不得载”的态度，应视作是王充晚年对《论衡》全书的态度，是传达《论衡》已完成于元和以前的一个重要信息。此外，在这个“附记”中，王充说的是章帝“元和、章和之际”的嘉瑞奇物、凤凰骐驎未能载入《讲瑞篇》，却并没有提到同为章帝在位时期的“建初”的嘉瑞奇物、凤凰骐驎是否载入《讲瑞篇》，显而易见，“建初”的嘉瑞奇物、凤凰骐驎当然应该是载入《讲瑞篇》的。然而奇怪的是，《讲瑞篇》中却并没有提到建初年间的嘉瑞奇物、凤凰骐驎，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因为在《论衡》的其他各篇中，建初年间的嘉瑞奇物、凤凰骐驎已被载入，所以在《讲瑞篇》的“附记”中，王充就没有再提到建初。这启示我们，《讲瑞篇》的这个“附记”，确实和《论衡》全书有关。既然建初年间的嘉瑞奇物、凤凰骐驎已在《论衡》其他各篇中作了记载，元和、章和以后的嘉瑞奇物、凤凰骐驎则“不得载”入（事实上，如下文将要谈到的，《论衡》各篇谈及当代嘉瑞奇物、凤凰骐驎，都只谈到建初为止），那么，这只能说明《论衡》在建初年间已经定稿了。而且《讲瑞篇》末的这段话，只能看作是王充在和帝永元年间重读《讲瑞篇》乃至《论衡》时所作的“附记”，而不能看作是王充在和帝永元年间对《讲瑞篇》乃至《论衡》所作的“修改”，更不能据此就认为《讲瑞篇》乃至《论衡》至此时方才定稿。因为“附记”毕竟和正文有别，“附记”的作年